

蜀布邛竹傳至大夏路徑的蠡測

桑 秀 雲

一、前 言

史記卷 123，大宛傳：

(張) 騫曰：「臣在大夏時，見邛竹杖蜀布。問曰：『安得此？』大夏國人曰：『吾國人往市之身毒。』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，其俗土著，大與大夏同。而卑濕暑熱云。其人民乘象以戰，其國臨大水焉。以騫度之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，居漢西南；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遠矣。今使大夏從羌中險，羌人惡之，少北則為匈奴所得，從蜀宜徑，又無寇。」……天子欣然，以騫言為然。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，出隴，出冉，出徙，出邛樊，皆各行一二千里。其北方閉氐，南方閉嶺昆明……終莫得通。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賈茲出物者或至焉。

上面這一段張騫和漢武帝之間的談話，使我對它發生很大的興趣。它告訴我們兩件事：其一，我國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，和印度北部已經有了商業上的交通；其二，我國和西域的往還，除了取道「絲道」以外，從中國的西南部也有道路可以通往。雖然在漢武帝時，通蜀印道未見成功，但不能證明當時沒有這條路。我認為蜀布邛竹除了取道雲南，緬甸，印度而至大夏外，不可能有別的走法。後來，發覺伯希和 (P. Pelliot)，R. C. Majumdar，和羅香林諸位先生也有這樣的看法(註一)，更加強了我的信念。本文主要在探索中國西南部和西域之間的通道；但這條通道是因大夏而起，所以下文先考大夏，最後對蜀布及邛竹也作一個簡單的研討。

(註一) 伯希和著，馮承鈞譯：交廣印度兩道考上卷，臺北，商務，一版，民 51，頁 10-11；R. C. Majumdar: Ancient Indian Colon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, Raopura, Baroda, 1955, P. 4；羅香林：百越源流與文化，見中華叢書，臺北，中華叢書委員會，民 44。頁 91。

二、大夏考略

1. 名稱：

以「大夏」爲名的國家，有的是從帝禹夏后氏而得名（註二）。但張騫出使西域時所見的「大夏」其名稱是怎樣得來的呢？有些學者認爲是譯音。例如王靜如（註三），張星烺（註四）等，而張氏認爲大夏和吐火羅同是 Tuhara 一字的譯音。新唐書卷 221 下，西域傳，挹怛國條也說：「大夏即吐火羅也」。

Tuhara 是 Scyths 民族中的一種。Scyths 是遠古時候一種游牧民族，以野蠻聞名於世。他們住在兩個分開的區域：一是黑海以北的草原，一是鹹海以東的地區。在紀元前七世紀時，他們侵入了中國西北，但後來又被驅逐出去（註五）。這種 Scyths 民族就是我國史書上所謂的塞種（或稱釋種），漢書卷 96 上，西域傳，罽賓條：

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賓。塞種分散，往往爲數國，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捐毒之屬，皆故塞種也。

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罽賓、以至休循、捐毒（北部）皆在錫爾河（Syr Darya）和阿姆河（Amu Darya）兩河流域的地方，這一區域是 Scyths 民族活動的範圍。因此，漢書所謂之塞種，也就是西史上的 Scyths 民族。Scyths 民族包括有若干部族，他們在語言，習慣及生活方式上大部份相似，在對付中亞和北亞的游牧民族，也多少採取聯盟的態度。這些部族之中，有一種叫 Tochari，分佈在錫爾河和阿姆河兩河上游之間的山中，大致在現在蘇俄中亞烏茲別克（Uzbek）共和國的地方；另有一種叫 Dahae，分佈在裏海以東，Hyrkania 以北，Herat 以西，大致在現在蘇俄中亞土庫曼（Turkmen）共和國的地方（註六）。Tochari 譯成吐火羅似已不成問題，而 Dahae 似與大夏之音較近。

大夏，一般都認爲就是西史上的 Bactria。大夏和 Bactria 之間又有什麼關係？

（註二）晉書卷 130 赫連勃勃載記：「自己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，國稱大夏」。

（註三）王靜如：西夏研究第一輯，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8，民 21，頁 77。

（註四）張星烺：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一冊，上古時代中外交通，臺北，世界，初版，民 51，頁 20。

（註五）Tamara Talbot Rice: The Scythians,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, 1957, 3rd Edition, 1961, P.20。

（註六）G. Rawlinson: The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, P 1872, P. 17.。

在紀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時，Bactria 是在波斯人統治下的一省。那時的 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 疆域廣大，西至地中海和愛琴海，東北至錫爾河。在興都庫什山 (Hindu Kush) 和阿姆河之間通到鹹海的一塊平原，便是 Bactria 省。在 Bactria 的西北部，便是 Dahae 部落的活動範圍。在 Dahae 部落的東邊，也就是錫爾河和阿姆河兩河之間的上游，就是 Tochari 部落的所在地。因此，我認爲無論就語音上或地望上來說，大夏應是 Dahae 而不是 Tuhara。大夏和吐火羅同是塞種民族中的兩個部落，而不是一個部落或地方。

2. 地望

大夏的位置，漢書卷 21 上，律曆志：

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，崑崙之陰，取竹之解谷。

崑崙有兩種說法：一說是國名；一說是山名。此處作「崑崙之陰」，顯然是指的「崑崙山」。當時的地理位置，從上文看來，似乎是在「大夏之西」，就是「崑崙之北」，所以大夏的位置，大約在現在新疆省的和闐和玉門之間。

帝堯時，曾接受過我國教化。賈誼，新書：

帝堯教化，訓及大夏渠搜。

渠搜，尚書禹貢作渠搜，逸周書王會篇和漢書作渠叟。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，據尚書禹貢所記：

黑水西河惟雍州，……浮于積石，至于龍門西河，會于渭汭。織皮：崑崙、析支，渠搜、西戎即敘。

上面一段是記大禹在雍州治水的情形。上古雍州在現在陝西、甘肅、青海三省及寧夏西部的地方。渠搜在這個區域內；而賈誼新書又將大夏渠搜並列，兩地應該相去不遠，因此，大夏亦應在本區之內。禹時大夏已向東移至山西的西部，史記卷 6. 秦始皇本紀：

禹鑿龍門通大夏。

龍門，山名，在山西河津及陝西韓城之間。（註七）鑿龍門，即溝通山西和陝西之間的交通，由此可通大夏，大夏據史記正義括地志云：「大夏，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

（註七）屈萬里，尚書釋義，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。臺北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初版，民45，頁34。

州。」〔註八〕可見大夏已逐漸發展到山西省的西部。堯時，大夏在陝西境內，禹時已東移至山西省的西部，在堯和禹中間的舜的時代，大夏也不應距離這個區域太遠。因此，自堯至禹時，大夏的位置，大致在中國的陝西和山西省的西部。

商湯時，大夏的方位，據逸周書卷7，王會篇所附伊尹朝獻商書所記：

正北空同，大夏，莎車，姑他，且略，豹胡，代，翟，匈奴，樓煩，月氏，獫狁，其龍，東胡，請令以橐駝，白玉，野馬，騊駼，良弓爲獻。

商湯時，湯居亳。亳，在今山東省曹縣南二十里〔註九〕，他的正北方，應該在今察哈爾省。因此，我以爲商湯時，大夏的位置，已由陝西和山西省的西部向東移動，到了今日的察哈爾一帶。

周成王時成周之會，大夏曾經入貢。逸周書卷7，王會篇：

大夏茲白牛，茲白牛野獸也，牛形而象齒。

但是沒有提到大夏的方位。自東周後期至秦統一全國後，其位置似又向南移，回到山西汾水一帶。史記卷32，齊世家：

於是桓公稱曰：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，北伐山戎、離枝、孤竹；西伐大夏，涉流沙；東馬懸車登太行山，至卑耳山而還。（正義：大夏，并州晉陽是也。）

史記卷6，秦始皇本紀：

（始皇二十八年）作琅邪臺，立石刻，頌秦德……皇帝之土，西涉流沙，南盡北戶，東有東海，北過大夏。（正義：杜預云：「大夏，太原晉陽縣，按在今并州」）上引二條之大夏，據史記正義：「大夏、太原晉陽縣，在今并州。」因此自東周至秦初，大夏的位置又回到現在山西省境內。

大夏的地理位置，黃帝時似乎是在新疆甘肅一帶，從堯至禹這一段時間，向東至陝西和山西境內，至商湯時，東遷到察哈爾一帶，到了秦朝，又回到了山西。因此，從黃帝至秦這一段時間內，這個民族似乎徘徊在中國北部，西起新疆東至察哈爾的地方，南北大約在北緯三十五度至四十五度之間。

但是在漢朝時，大夏的位置，已越過了中國現在的西境。史記卷123，大宛傳：

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，媼水南……及大月氏西徙，攻敗之，皆臣畜大夏，

〔註八〕 見史記卷6. 秦始皇本紀。

〔註九〕 王國維：說毫見觀堂集林卷12，臺北，藝文，再版，民47。

……其東南有身毒國。

大夏在大宛的西南，大宛又在何處？大宛的位置，據漢書卷 96 上，西域傳：

自玉門陽關出西域，有二道：從鄯善傍南山，北波河，西行至莎車，爲南道。南道西踰葱嶺，則出大月氏，安息。自車師前王庭隨北方波河，西行至疏勒，爲北道。北道西踰葱嶺，則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。

關於大宛、康居、奄蔡三個地方，丁謙的蓬萊軒地理學叢書，漢書西域傳考證，說的很清楚。

北道踰葱嶺，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者，則從喀什噶爾北上察克瑪克，越圖魯嘎爾特山口，西北過古爾槎俄礮臺，歷鄂什，安集延二城，以至浩罕，即漢大宛國。再西北抵塔什干，順錫爾河北行至鹹海，即漢康居國，再西由裏海北至今俄國南黑海濱，即漢奄蔡國也。

大宛大約是在現在俄國中亞吉爾吉斯 (Kirghiz) 共和國境內。媯水是現在的阿姆河，身毒即是現在的印度。因此，漢朝大夏的位置，大約是在今日的阿富汗境內。

大夏的地理位置，由黃帝至秦朝的中國北方，遷至漢時的今阿富汗境內，其原因何在？古時民族的遷移，多半由於原來居住的地方，有不適合生存的因素，如遭受天災，或是人禍。最顯明的例子，北匈奴之向西遷移，由於南匈奴和漢朝聯合，繼續不斷的予以打擊；以及氣候奇寒，牲畜多半凍斃。大月氏的西遷，是由於匈奴的逼迫。大夏的西遷，究竟是什麼原因呢？從史籍上，找不出在上古時中國北方有任何重大天災發生，另一可能便是受到外力的壓迫。例如前面提到的，齊桓公曾西伐大夏。秦穆公也曾對西方用兵。史記卷 5，秦本紀：

(穆公) 三十七年，秦用由余謀伐戎王，益國十二，開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秦穆公「開地千里」，可能已到了今日的新疆，而古代大夏在中國境內建國的地方，便可能在新疆和青海這個區域以內。由於秦向西方用兵，這個區域內的民族，有的臣服，但也有不願臣服，因而遠走他方。大夏是否在這種情形下西徙，我們不敢斷定，但無疑的有這個可能。

3. 史蹟：

大夏立國很早，相傳黃帝正音律，派遣伶倫（又作伶倫）出外找竹子，就已有這個國家的存在。因此，至少在黃帝時，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，大夏似乎就已經建

國。帝堯時，大夏和渠搜，同時接受我國的教化。禹鑿龍門以通大夏，至周成王大會諸侯時，大夏以茲白牛入貢。東周、秦齊二國對西方用兵，大夏之名，間或出現。此後，直至漢武帝時，張騫出使西域各國，在大夏見到蜀布邛竹，才又見大夏的名稱。

關於大夏的情形，如果僅僅根據我國古籍上有限的記載，是不容易得到充分的瞭解的。所幸這個地方在古代地位重要，是東西文化的會合點。因此，西方也有不少關於大夏的著述，正好作為補充。

大夏，在紀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時，是在波斯人的統治之下。紀元前四世紀時，馬其頓 (Macedonia) 崛起，亞力山大大帝 (Alexander the Great) 於紀元前 334 年領兵東征，不到五年的時間，便征服了小亞細亞，敘利亞，埃及和伊朗高原。在紀元前 329 年，征服了 Bactria 和 Sogdiana。Sogdiana 在 Bactria 的北部和東北部，是波斯帝國的邊防重地。亞力山大征服了這兩處地方以後，便在這裏設立守備隊。亞力山大在東征時，每征服一處地方，便在該地建立起希臘化的殖民地，以傳播希臘文化。Bactria 是東征的最後一站，距離希臘本土最遠；但却是在敘利亞以東接受希臘文化最深的地方，其原因何在？由於亞力山大征服 Bactria 以後，建立起龐大的帝國，與東方的印度，阿拉伯，以及北方的高加索之間的關係都很好，唯一的威脅，便是來自錫爾河那邊的塞種 (Saka) 遊牧民族。在波斯帝國時，Sogdiana 便配置重兵防守，迨亞力山大征服了這塊地方，自然也從波斯人手中接替了這裏的邊防重任。因此，希臘殖民地在 Bactria 建立了，希臘文化也在這裡發榮滋長。繁榮的結果，使得 Bactria 即使和歐洲的希臘以及其他的希臘文化中心斷絕來往以後，他仍然保持一段時期的中心地位，繼續傳播着希臘文化。

亞力山大大帝在紀元前 324 年去世，他所建立的大帝國也分裂為三。亞力山大的老家馬其頓，由 Antigonus 王朝統治；埃及由 Ptolemy 王朝統治；自西亞以至印度北部，由 Seleucus 統治，而 Bactria 自然也在 Seleucus 王朝統治之下。Seleucus 王朝爲了要抑制埃及 Ptolemy 王國的發展，另一方面要保持在地中海沿岸的勢力，便將首都設在國土的最西邊——敘利亞的 Antioch；同時在底格里斯設立一個副王，監督東方的事務。這樣的安排，造成了東方各地的離心力，成為分離的希臘城邦。因此，在紀元前三世紀中葉，Bactria 的地方官 Diodotus 一宣佈獨立，便得到

希臘殖民地強力的支持(註一〇)。Bactria 獨立以後，逐漸強大，不受敘利亞的控制，同時與波斯互爭雄長(註一一)。從紀元前 206 年至 185 年之間，是 Bactria 最繁榮的時期，他從一個小王國擴張為一個大帝國，佔有今日阿富汗大部份地方。Bactria 王 Demetrius 並越過印度河，到了 Punjab 區，並征服 Hydastes 河上的城市(註一二)。

此後，大夏國勢盛衰不定，至紀元前一百七十年左右，月氏被匈奴壓迫向西移動，分為兩支，小月氏南下，大月氏向西，過伊犁河，到大宛和錫爾河流域。不久，見逼於烏孫，又繼續向西，來到阿姆河和裏海，大夏被迫退到阿姆河以南。漢書卷96上，西域傳：

大月氏，本行國也。……本居敦煌祁連間，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，而老上單于殺月氏，以其頭為飲器，月氏乃遠去，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，都犂水北為王庭。……大夏本無君長，城邑往往置小長，民弱畏戰，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，共稟漢使者。有五翎侯。

大月氏破大夏是在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後的事，老上單于大約和漢文帝同時而稍晚。漢書卷 94 上，匈奴傳：

孝文即位，復脩和親。三年夏，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，文帝發車騎八萬詣高奴，遣丞相灌嬰往擊之，……明年，單于遣書復求和親，許之。頃之，冒頓死，子稽粥立，號曰老上單于。

老上單于即位較漢文帝晚四年，漢文帝是在紀元前 179 年即位的，所以稽粥大約是在紀元前 176 年即單于位。因此，大月氏破大夏也是在紀元前 176 年以後的事。

大月氏破大夏以後，成立五翎侯，到紀元前結束不久，五翎侯之一的貴霜翎侯丘就卻，又攻滅了其他四翎侯，擴張領土；丘就卻的兒子閼膏珍又滅天竺，國勢很盛。後漢書卷 118，西域傳：

大月氏國，……初月氏為匈奴所滅，遂遷於大夏。分其國為休密，雙靡，貴霜，盼頓，都密，凡五部翎侯。後百餘歲，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，自立

(註一〇) G. F. Hudson: Europe and China, 1931, Beacon paperback in 1961, pp. 55-57.

(註一一) G. Rawlinson: The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, p1872, pp. 58-59

(註一二) 同上 pp. 62-63.

爲王，國號貴霜王。侵安息，取高附地，又滅濮達，屬賓，悉有其國。丘就卻年八十餘死，子閼膏珍代爲王，復滅天竺，置將一人監領之。

至此，大夏可說已滅亡了。而張騫到大夏的時間，是紀元前 139 年前後。這時的大夏，已被月氏入侵，正是貴霜王朝的時期。

三、蜀印交通

漢初，從四川至印度的道路，可以有三個可能的途徑。第一、北道：是大紆迴的路徑，從四川先至長安，再從長安取道河西走廊，經新疆，越帕米爾高原，至大夏、印度。第二、西道：從四川向西走，經西康、西藏至印度。第三道、南道：從四川向南，經雲南，緬甸北部，再折而向西至印度。

第一道，亦即從四川先至長安，再從長安取道河西走廊的道路，係張騫通西域以後，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主要交通路線。無論是使節往來，或是商賈貿易，皆走的這一條道路。但是張騫在大夏所見的蜀布邛竹，却似乎走的不是這一道。因爲走這一道的貨物，必須先經過大夏，然後才到印度。大夏人不太可能再到印度去購買已經經過大夏本境的東西。其次，張騫在這一條道路上來往不止一次，逗留的時間也很長久，如果蜀布邛竹果真走的這一條路，即使他沒有親見，至少他也應該風聞，不太可能一見到蜀布邛竹，便有「身毒國去蜀不遠，其間有道可通」的想法（註一三）。

第二道，從四川向西走，經過西康，西藏至印度的這一條路，至少在漢武帝元狩年間是不可能的。漢武帝曾先後派使甚至派兵，希望從四川向西找出一條通往大夏的道路，可惜都沒有成功。當時還以爲是氐、徼、嶺、昆明等國從中作梗，實際上，恐怕真正是無路可通。此後，由於從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多，漢廷也就不再積極尋求從蜀通往大夏的道路了。史記卷 123，大宛傳：

（張）騫曰：「……今使大夏從羌中險，羌人惡之；少北則爲匈奴所得。從蜀宜徑，又無寇……。」天子欣然，以騫言爲然。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，出驢，出冉，出徙，出邛僰，皆各行一二千里，其北方閉氐徼，南方閉嶺昆明。昆明之屬無君長，善寇盜，殺略漢使，終莫得通。

（註一三） 史記卷 123，大宛傳：「自身毒國……此其去蜀不遠矣。」又同卷：「今使大夏……從蜀宜徑……。」

同書卷 116，西南夷傳：

（張）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，慕中國，患匈奴隔其道。誠通蜀，身毒國道便近，有利無害。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，栢始昌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，指求身毒國。至滇，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四十餘輩。歲餘，皆閉昆明，莫能通身毒國。

同書卷 123，大宛傳：

是時，漢既滅越，而蜀西南夷皆震，請吏入朝。於是置益州，越嶲，牂牁，沈黎，汶山郡，欲地接以前通大夏。乃遣使栢始昌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，抵大夏。皆復閉昆明，爲所殺，奪幣物，終莫能通至大夏焉。於是漢發三輔罪人，因巴蜀士數萬人而去。其後遣使昆明，復爲寇，竟莫能得通。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，而外國益厭漢幣，不貴其物。

西藏和漢族發生直接的關係，是從唐朝開始。唐太宗時以文成公主嫁棄宗弄讚，公主篤信佛教，入藏時帶了一個釋迦牟尼的佛像，奠下藏人信仰佛教的基礎。嗣後，棄宗弄讚更派人至印度研究佛法（註一四）。以佛教傳播力之大，而西藏在地理位置上，又和印度毗鄰，竟沒有受到影響，要等唐初文成公主入藏，才將佛教帶入，可以想像唐朝時候的西藏，其交通是十分蔽塞的。也可以想像在漢時，其蔽塞的程度更甚於唐，當時的西藏跟外界可說毫無接觸。因此，從西藏通往印度的路也是不太容易的了；即使漢廷越過西康，也無法突破西藏這一道障礙而到印度的。

第三道，從四川向南，經雲南，緬甸北部，再向西至印度。蜀布邛竹取道這一條道路，似乎是唯一的可能了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（P. Pelliot）認爲：「此種中國西南之出產，似祇有緬甸一道可以輸出。」（註一五）。此外，R.C. Majumdar 也認爲：「紀元前二世紀時，中國和東印度之間；經由雲南和上緬甸，有一條經常可通行的陸上貿易路線。」（註一六）。他們並沒有說出這一條路是怎樣走法，他們只是有此假定，有此懷疑而已。

在研究蜀印交通的可能性之前，第一步先研究四川至雲南交通的可能性。四川和

（註一四） 周昆田：漢藏兩族的傳統關係。載西藏研究，臺北，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，民 49，頁 5。

（註一五） 伯希和著，馮承鈞譯：交廣印度兩道考上卷，臺北，商務，一版，民 51，頁 10-11。

（註一六） R.C. Majumdar: Ancient Indian Colon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, Raopura, Baroda, 1955, P. 4.

雲南之間的交通，可能開始的很早。史記卷 116，西南夷傳：

秦時，常頡略通五尺道，諸此國頗置吏焉。

所謂「常頡略通五尺道」，「五尺道」位於何處？正義引括地志：「五尺道在郎州」。郎州在現在的貴州遵義縣。而顏師古云：「其處險阨，故道纔廣五尺。」一般說來，四川以南，地勢崎嶇，道路修築不易，因此，通往蠻夷的道路，只有五尺寬，而郎州的五尺道，只是其中的一條。所謂的「諸此國」應指的是巴蜀西南外蠻夷——夜郎，滇，邛都，嵩，昆明，徙，笮都，冉，駼，白馬諸地中的某一些地方。例如：邛笮冉駼，秦時便設立郡縣。史記卷 117，司馬相如傳：

天子問相如，相如曰：「邛、笮、冉、駼者，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時嘗通爲郡縣，至漢興而罷。」

邛笮冉駼是在四川西南，雲南西北地方，秦時既在上述地區設置郡縣，那麼兩地之間的交通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。

漢時，始通滇國。史記卷 123，大宛傳：

漢以求大夏道，始通滇國。

滇國據丁謙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攷證：「滇國以滇池名，今雲南昆明縣。」漢時，四川和雲南之間，不僅有交通往來，且有商業行爲。史記卷 116，西南夷傳：

秦滅及漢興，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。巴蜀民或竊出商賈，取其笮馬僰僮髦牛，以此巴蜀殷富。

笮馬是笮都之馬，笮都：索隱引韋昭云：笮縣在越嶲郡，在雲南西北部。僰僮，僰：芮逸夫先生認爲：「兩漢僰人的主要分佈地域，當在今四川西南，岷江和金沙江下游，川江上游，舊叙州府屬各縣地。」（註一七）

蜀人的商業往來，遠到夜郎，由夜郎再至南越。史記卷 123，西南夷傳：

（王）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，南越食蒙蜀枸醬，蒙問所從來，曰：「道西北牂牁，牂牁江廣數里，出番禺城下。」蒙歸至長安，問蜀賈人。賈人曰：「獨蜀出枸醬，多持竊出市夜郎。夜郎者，臨牂牁江，江廣百餘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，西至同師，然亦不能臣使也。」

（註一七） 芮逸夫先生，僰人考。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冊。民 40，頁 251。

由於蜀賈人足跡甚廣，漢武帝時史書所見的北至長安，東到夜郎，西至笮都，南方也到了雲南西北和東部。

蜀賈人南下，究竟到了什麼地方。史記卷 123，大宛傳：

然聞其（按：指舊昆明）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賈姦出物或至焉。漢時的昆明在現在大理西南（註一八），其西千餘里有滇越國，以象爲騎乘代步。

後漢書卷 118，西域傳：

從月氏高附國以西，南至西海，東至槃起國，皆身毒之地。

張星烺認爲：「槃起國據古音考之，似卽孟加拉（Bengal）」（註一九）。

三國志卷 30：

盤越國，一名漢越王，在天竺東南數千里，與益部近。其人小，與中國人等，蜀人賈似至焉。

張氏以盤越國就是後漢書上的槃起國。盤越與益部近，更可證明爲孟加拉（Bengal）（註全上）。

梁書卷 54，諸夷傳：

從月氏高附以西，南至西海，東至槃越，列國數十。每國置王，其名雖略，皆身毒也。

後漢書之槃起國，三國志之盤越國，梁書之槃越，皆是一地。在現在巴基斯坦的孟加拉，漢時蜀賈人似乎來到這裡。而史記上的滇越，和盤（槃、磐）越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「滇越」據史記正義的說法：「昆郎等州皆滇國也，其西有滇越，越嶺，則通號越，細分而有嶺滇等名也。」（註二〇）。同時史記又記「滇越」是在昆明（今大理西南）以西千里的地方，其地位大致和三國志上盤越國的地位相符，說明了「滇越」「盤越」二者之間的地理關係，即使不同一地，至少也相當的接近。因此，我們說漢初蜀賈人的足跡曾至孟加拉，應該不是誇張之詞。

蜀人至孟加拉，最便捷的道路，便是向南至雲南西部，經過緬甸向西走，到孟加

（註一八） 全上，頁 263-265。

（註一九） 張星烺：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六冊，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。臺北，世界，初版，民 51，頁 42。

（註二〇） 見史記卷 123，大宛傳。

拉。由四川向南至雲南西部的道路已通，前面說到，漢武帝時因通大夏道而通滇國，又因昆明阻道而對之用兵，滇國今昆明，漢昆明今大理西南。所以從現在的昆明到大理這一段在漢武帝時已和四川相通。雲南西部在地形上稱為「滇西縱谷」，這一區域內的山脈、河流都是南北縱走的方向。山脈有雲嶺、怒山、高黎貢山，江心坡，野人山等；河流有元江，瀾滄江，怒江，恩梅開江，邁立開江，更的宛河等沿上述山脈而成縱谷。兩旁的山嶺，高出河谷一、二千公尺或數百公尺不等。河流多屬上游，坡度和落差皆大，水勢急，不利於航行。因此，這一地區的河流雖然多，但是交通價值不大。儘管這一地區地勢險惡，河流的交通價值不大，但自古以來，山谷和河流就是最好的自然交通孔道。

關於滇緬之間的交通路線，我們可以根據歷史上的記載，從現在向上推溯，以找出漢武帝時滇緬之間可能的交通路線。

第一、滇緬公路。這一條公路築於抗戰後期，路線從昆明市向西，經下關，保山，龍陵等地，更由國界上的畹町，南通緬甸的臘戍。

第二、抗戰以前，由雲南西部入緬甸有三道。由雲龍、滇錄卷1：

1. 由維西，經茨開（舊菖蒲桶行政區域），至坎底。
2. 由瀘水，經片馬，至密支那。
3. 由騰衝，經干崖，蠻允，至八莫。

以上三路，由維西至坎底的這條路，中間經隴格、敢當等土司，及雪山、瑩王、李克等高山，極為難行。由坎底至密支那亦有路可通，全程需廿七、八日。由騰衝至八莫，全程只需八日，又係舊日的驛道，是滇緬商人往來的孔道。

第三、唐時，樊綽蠻書對當時雲南的交通情形，記載的很詳細。但西邊只到大理為止；大理以西、以南都沒有記載，只在山川江源中略提一二，而不能構成一個交通線。此外，唐貞元時賈耽曾有邊州入四夷道里記載，共有七道。其中第六道是安南通天竺道，經過路線是自安南、經雲南、緬甸至印度。此處將自大理至印度的路線摘出，共有兩道。新唐書卷43下，地理志下：

……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，又入驃國境，經葛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，又經突旻城至驃

國千里，又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。……一路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，又西至彌城百里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，乃西渡麗水、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，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，至大秦婆羅門國，有西渡大嶺至東天竺北界箇沒盧國。

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中，稱自羊苴咩城至迦摩波國爲「雲南入緬甸之西南一道」；自諸葛亮城至箇沒盧國爲「雲南入緬甸之正西一道」。據他的考訂，西南一道的羊苴咩城是現在的大理，永昌今縣，諸葛亮城在騰越之西，樂城伯氏認係舊唐書卷 197 之些樂城，亦就是蠻書卷 6 之磨些樂城；而磨些樂城，向達懷疑應該在騰衝以南（註二一）。萬公，張星烺認爲是孟拱（註二二）。悉利城在太公（Tagaung）城之南，曼大來城（Mandalay）之北。突旻似爲蒲甘（Pagan），黑山爲 Arakan Range，迦摩波國在今阿薩密（Assam）的 Kamarupa。正西一道，騰充今騰越之西，彌城皆不知今地，向達謂只知其在麗水（伊洛瓦底江）以東而已（註二三）。麗水國，伯氏認爲係八莫或其北之一地，向達認爲在騰越西，麗水東，確實地點亦不敢決定。安西城，向達認爲只知道在麗水西而已（註二四）。彌諾江，伯氏認爲是 Chindwin，大嶺爲 Barel Range，大秦婆羅門似在 Manipur 附近。箇沒盧、即是迦摩波國，二地同爲 Kamarupa 之譯音。即在 Assam 的 Gauhati。

這兩道用現代地名表示：西南一道是自大理至永昌，渡怒江至騰越之西，向南經騰衝南入驃國，經孟拱，又經太公城和曼大來城之間，至蒲甘向西穿越 Arakan Range 到阿薩密的 Gauhati。正西一道，自騰越西經麗水東岸至八莫或其北某地，渡麗水至麗水西岸，再渡 Chindwin 到 Manipur 附近，度 Barel Range 到阿薩密的 Gauhati。

第四、這一條道路是滇緬之間通路的最早記載，是在東漢時候。後漢書卷 116，哀牢夷傳：

（註二一）向達：蠻書校注卷 6，1962，P.167。

（註二二）張星烺：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六冊，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。臺北，世界，初版，民 51，頁 109。

（註二三）同上。

（註二四）同上。

(永元)九年(97 A.D.)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重譯，奉國珍寶，和帝賜金印紫綬，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。……永寧元年(120A.D.)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貢，獻樂及幻人，能變化，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馬頭，又善跳丸，數乃至千，自言我海西人，海西即大秦也。

一般認為，撣國就是現在的南北撣邦(Northern and Southern Shan States)(註二五)。以上四條是從抗戰後期上推至東漢時滇緬之間的通路，前三條都可找到現在所經過的地方。從上面的道路看來，雖然滇西可以有好幾條通往緬甸的道路，最主要的似乎是從永昌經騰衝至緬甸八莫的這一道。這一條路自唐以來就成為滇緬之間的幹道，至今已有千年的歷史。一條天然道路的形成，是經過許多人，經過若干年的摸索，探尋，比較而得到兩地之間最便捷的一條道路。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之中，沒有新的築路技術，沒有新的交通工具發明的情況下，一條已經形成的道路，可以一直使用下去。這便是騰衝至八莫這一條道路有千年歷史的原因。實際上，還不止千年之數。唐時，這條路上已有驛館的設置，表示當時交通量已經很大，這條路已成為驛道。因此，這條道路的形成，更可以往上推若干年。我認為撣國入貢的路線，有極大的可能是從八莫至永昌、昆明，而至長安。而大秦賈人由海路至緬甸，經伊洛瓦底江口逆流上航至八莫，再取撣國入貢的路線至中國。

撣國入貢是在紀元後97年及120年，而蜀布邛竹流傳至大夏的時間是在紀元前122年(漢元狩元年)以前。時間上相差了二百年。即撣國入貢前的二百年，這條入貢的道路是否已經通行？我認為撣國雖在紀元後97年首次入貢，並不表示這條道路在紀元後97年才有，它必定早於紀元後97年，也有可能早二百年前便已通行，從史記、漢書中可以看出，漢武帝不止一次派使臣到四川求通大夏的道路，派到各地的使臣，只有在昆明(今大理西南)一地有漢使被殺，財物被掠奪的事情發生；各地派出去找路的人都沒有找到，而漢廷偏派昆明尋找不力，要對他用兵。細想起來，其中也不無道理。漢時昆明在滇西，正控制滇緬之間的交通。我認為當時昆明與緬甸之間的交通已很普遍，昆明怕漢使知道這件事實，所以殺之以滅口。漢使既被殺，財物自然也被沒收；其次，也許漢廷根本已經知道從雲南可通大夏，所謂的「道不通」只是由於昆明

(註二五) 芮逸夫先生，樊人考。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二十三本上冊，民40，P.276。

從中作梗，所以要對他用兵，以示儆戒。可惜的是，當時的漢朝要用全力對付北方的匈奴，沒有餘力再來開發南方；同時由於取道絲道也可以通往大夏，因此便沒有再積極的尋求通大夏的道路了。

在滇西縱谷上的交通，最大的困難是如何通過縱谷兩側高度數百公尺至一、二千公尺的崇山峻嶺，以及波濤汹涌，無舟楫航行之利的急流。從若干記載上，可以看出橫度縱谷的情形。向達，蠻書校注卷1，雲南界內途程第一：

從河子鎮至末柵館五十里，至伽毗館七十里，至清渠舖八十里，渡繩橋，至藏傍館七十四里。

同書卷2，山川江源第二：

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，即永昌也。兩岸高險，水迅激，橫互大竹索爲梁，上布簣，簣上實板，仍通以竹屋蓋橋。

(向)達案：自龍尾城七驛至永昌，中經漢博南縣，即今永平。由此西渡博南山，今名丁當丁山，下山度蘭津，即瀾滄江橋，過橋爲羅岷山。博南、羅岷夾峙江上，所謂兩崖高險者是也。過羅岷西南八十里至永昌，唐宋以前俱用竹索爲橋，元更木構，明清改爲鐵索，有西南第一橋之稱。

現在此一地區的交通，橫度縱谷時，通用索橋。索橋高懸兩岸，上舖木板，以通行旅。這種「索橋」可能是由古老的方法「懸度」演變而來。懸度的方法，我國早已經採用，國語齊語記桓公：

西征攘白狄之地，至於西河，方舟設汭，乘桴濟河，至于石枕，懸車束馬，踰太行與卑耳之谿拘夏，西服流沙、西吳、南城於周，反胙于絳。

而前、後漢書上更以這種過渡的方法作爲地名(註二六)，更可證明這種方法之古老。所謂懸度，就是河或谷的兩岸牽引一根繩子，人身懸空，用手在繩上移動而到彼岸。所謂懸空而度，或許就是「懸度」得名的由來。不僅人可以這樣度過山谷，動物和貨品也可以這樣度過。所謂「束馬懸車」，也就是用的這種方法。當然這種方法很危險，於是在下端也牽引一根繩子，使足部也有立足點，手足同時移動，一方面比較省力，另一方面速度較快。如果同一個地方同時有兩個這樣手足同時移動的過渡設備的話，

(註二六) 見漢書卷96上，關賓傳。卷96下，烏孫傳。後漢書卷118，德若國傳。魏書卷102，阿鈞羌傳。

他們總有一天會發現將兩根下面的繩子連起來，可以增加安全，走更多的人，運更多的貨物，這便是繩橋。繩索上面再鋪木板，可以走的較安穩，於是「索橋」便這樣產生了。由造橋材料的進步，由索橋進而為木橋，鐵橋。縱谷上最大的交通困難解決，滇緬之間的交通也就沒有問題了。

蜀印交通已經解決，附帶一提的是大夏和印度的交通。印度人的主幹，原是高加索 (Caucasian) 種的一支。在很早的時候，沿喀布耳 (Kabul) 河進入印度，和當地的居民混合，成為印度雅利安型 (Indo-Aryan)。當初的移民，由兩條路徑，一由西北入境，分佈在現在的旁遮布 (Pajab) 和喇日埔坦那 (Rojputana) 兩省。另一由北方的 Gilgit 和 Chitral 進入，路徑極為難走 (註二七)。亞利安人進入印度的時間已不可考，各家的說法也不一致。折衷的說法，以紀元前二千年左右，亞利安人已進入印度 (註二八)。

紀元前四世紀時，亞力山大東征。他在紀元前 327 年，越興都庫什山，從喀布耳河進入。在紀元前 326 年，渡過印度河 (Indus R.)，然後進入 Takkasila 城。這個繁榮的城市是印度河和 Hydaspes R. 之間的地方的首都。從 Takkasila 向東，襲擊在 Hydaspes R. 和 Akesines R. 之間的統治者 Poros。亞力山大渡 Hydaspes 得到大勝，正準備乘勝前進，但他的攻勢在 Hyphasis 受阻，他的士兵不肯再往前進，只好循着來路退兵 (註二九)。

紀元前二世紀左右，大月氏破大夏。國勢很盛，曾統治天竺、東離等國。後漢書卷 118，天竺國傳：

從月氏高附國以西，南至西海，東至罽越國，皆身毒之地。身毒有別城數百，城置長；別國數十，國置王。雖各小異，而俱以身毒為名，其時皆屬月氏，月氏殺其王而置將，令統其人。

同卷，東離國：

東離國，居沙其城，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，大國也。其土地物類與天竺同，列城數十，皆稱王。大月氏伐之，遂臣服焉。

(註二七) 林惠祥，世界人種誌，第五章。上海，商務，民 21，P. 135。

(註二八) Vincent A. Smith: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, Oxford, 1920, p. 8.

(註二九) 同上，p.p. 59-64.

東離國，丁謙認為在孟加拉部加爾各答城西南，沙奇城似乎是西北部的沙遮亨普爾城（註三〇）。

從地理上看，印度的地形可分為三部份。一、由恒河和印度河所形成的北部平原。二、在 Narbada R. 之南；Krishna 和 Tungabhadra R. 之北的德干高原。三、極南部份，包括 Tamil States（註三一）。三個區域之中，北部平原土地肥沃，地形又呈開放性，易引起外族的入侵。從雅利安人開始，主要在印度北部；然後是亞力山大，從印度的西邊，大月氏從印度的東邊，這一連串經由東西兩路，由北而南的外族入侵和軍事行動，自然引起印度本境民族的遷移，直接影響到交通的發展。因此，在漢武帝時，甚至是以前，印度南北之間的往來，商賈的旅行，已經是很普通的事了。

四、釋蜀布邛竹

在漢朝時候，我國的絲織品已經很有名氣。絲織品和刺繡，已經由朝廷的贈予或是商人販賣的方式，取道「絲道」——即河西走廊，經天山南北路，跨帕米爾高原，向南經今日的阿富汗，伊朗，小亞細亞，北經蘇俄中亞，同達地中海的東岸，也就是羅馬帝國的東境。而大夏正位於這條路線上，如果在這裏發現我國的絲織品，應該是毫不足奇的一件事。但張騫在這裏所看到的是「蜀布」，因此，在這裏要附帶地討論一些有關「蜀布」的問題。

「蜀布」究竟是什麼？首先我們要澄清一下對「布」的觀念。現在的觀念，都以布是棉織品，實際上，棉花傳入我國很晚，到宋朝時才傳入（註三二）。因此，我國早期所謂的布，皆指「麻」「枲」「葛」一類的織物所說的。

蜀最早的「織」物，首先見於夏。夏禹平定水患，分天下為九州。巴蜀之地稱為梁州。梁州的貢物之中，有一種叫做「織」的東西。尚書禹貢：

厥貢璆，鐵，銀，鏤，砮磬，熊羆狐狸，織皮。

孫星衍，尚書今古文注疏以為：「織皮者，綱之屬。……」。 艾南英、禹貢圖註以為：「熊羆狐狸，四獸之皮，製之可以為裘，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。」看以上的說法，

（註三〇） 丁謙，蓬萊軒地理學叢書一，後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，臺北，正中，初版，民51，頁320-31。

（註三一） Vincent A. Smith: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. Oxford, 1920, p.p. ii-iii.

（註三二） 于景讓，明季時珍本草綱目「木棉」項箋釋。大陸雜誌，第九卷，第五、六、七期。

以野獸的皮織之爲織皮，毳毛織之爲罽。織皮，只是獸皮的加工，罽可能是很粗陋的編織物。可能當時已有了「織」的技術。

周武王克殷，從當地的物產中，發現了「織」物的原料。華陽國志，卷1：

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於巴，爵之以子。……其地東至魚復，西至樊道，北接漢中，南極黔涪，土植五穀，牲具六畜，桑蠶麻紵，魚鹽銅鐵，丹漆茶蜜，靈龜巨犀，山雞白雉，黃潤，細粉，皆納貢之物。

桑蠶麻紵，自然是「織」物的原料。蠶絲與麻的出產，在巴、蜀甚爲普遍。巴郡的墊江縣和巴西郡、蜀郡皆有桑蠶、武都郡梓潼縣有麻田，蜀郡安漢和上下朱邑也出好麻（註三三）。由蠶絲與麻所織成的織物，自然是「帛」與「布」了。文獻上有「帛」與「布」記載，已在秦惠王時候。華陽國志、卷3：

巴與蜀仇，故蜀王怒伐苴侯，苴侯奔巴，求救於秦。秦惠王方欲謀楚，……司馬錯、中尉田真黃曰：「蜀有桀紂之亂，其國富饒，得其布帛金銀，足給軍用。水通於楚，有巴之勁卒，浮大船舩以東向楚，楚地可得。得蜀即得楚，楚亡則天下併矣。」惠王曰：「善」。

由此看來，巴、蜀的「布」和「帛」，似是同時開始的。但發展到後來，以絲爲原料的織物，無論在技術上，染色上，花紋圖案上，都大大的超過了以麻爲原料的「織」物。由於織作技術的不同，因而產生了許多不同名目的絲織品，而最享盛名的，便是「蜀錦」。

「蜀錦」，華陽國志，卷3：

始文翁（孝文帝時蜀守）立文學精舍講堂，作石室，一作玉室，在城南。永初後堂遇火，太守陳留高暉更修立，又增造二石室。州奪郡文學爲州學，郡更於夷里橋南岸，道東邊起文學，有女牆；其道西，城，故錦官也。錦江，織錦濯其中，則鮮明，濯他江則不好，故名曰錦里也。

蜀郡治夷里橋的南岸，道東邊是郡文學，道西有城，即錦官所在，又稱錦里。有特別適合濯錦的錦江。凡此，皆足以說明在東漢安帝永初年間（107-113 A.D.），「蜀錦」已很普遍了。那麼，「蜀錦」應該在東漢安帝以前便有了，至於早到什麼時候？是否

（註三三） 見華陽國志卷 1、2、3。嘉靖四十三年張氏刊本。

早到漢武帝時，張騫在大夏所見的「蜀布」便是「蜀錦」呢？這似乎不太可能，其原因：

一、漢朝的絲織業以及附帶的刺繡手工藝，其中心都不在蜀。王充、論衡卷12，程材篇：

齊郡世刺繡，恒女無不能；襄邑俗織錦，鈍婦無不巧，日見之，日爲之，手狎也。

漢時刺繡中心是齊郡，織錦中心是襄邑。不僅織、繡業不在蜀，與織繡有關的製衣中心也不在蜀。漢時供應天子衣服的三服官，也在齊地。漢書卷72，貢禹傳：

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筥，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，一歲費數鉅萬。漢書卷28上，地理志也說：齊郡臨淄縣和陳留郡襄邑縣都設有服官。而襄邑既是織錦的中心，又是服官的所在地，其繁榮是可以想見的。所以漢時的絲織業可以說是偏在東方。

由於我國蠶絲業發明很早，一般農家，只要氣候適宜，都以飼蠶作爲副業，所謂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」桑樹除了葉子可以飼蠶外，其他的經濟價值不大，因此，有桑的地方必定飼蠶。在四川，從華陽國志上可以看出很多地方種植桑麻，因此，蜀地飼蠶必很普遍，只是絲織業尚未發展到執其中牛耳的地步。這是斷定「蜀布」不是「蜀錦」的第一個原因。

二、漢時，蜀以製作金銀器著名。漢書卷72，貢禹傳：

蜀、廣漢，主金銀器，各用五百萬。

蜀地鑛產豐富，禹貢上便記有：「鐵、銀、鏤」等名稱。漢時蜀地金銀器的製作，一歲費五百萬錢，相信人力的配合運用也相當的多。在金銀器製作上消耗的人力物力既多，相對的，在絲織業方面必少，這也是漢朝蜀地絲織業不能全力發展的原因。

三、張騫是漢中郡人，漢中在地理上和巴蜀毗鄰，兩地的交通必很頻繁，因此，彼此間的情形一定瞭解的很清楚。同時，張騫自建元中爲郎官，出身不低。此後，出使西域各國，經歷的地方既多，所見所聞自然也很豐富，因此，不太可能「布」「錦」不辨。基於以上三個原因，「蜀布」爲「蜀錦」之誤的可能是非常的少。

「蜀布」既不可能是「蜀錦」，便是屬於麻葛一類的製品了。漢書顏注採服虔的

說法：「布，細布也。」（註三四）這種「細布」，可能是一種纖維很細，織作的很緊密的一種布。華陽國志卷3，蜀志：

（蜀郡）安漢，上下朱邑出好麻，黃潤細布，有姜筒盛。

用蜀郡安漢和上下朱邑所生產的好麻，織成的細布，顏色略黃，但很光滑細密，用姜筒盛着以資保護。這種黃潤細布，可以上溯到周初時代。華陽國志卷1，巴志：

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於巴，爵之以子。……土植五穀，牲具六畜，桑蠶麻紵，魚鹽銅鐵，丹漆茶蜜，靈龜巨犀，山雞白雉，黃潤，細粉，皆納貢之物。這裏所說「黃潤、細粉」之黃潤，應該就是安漢和上下朱邑所出產的「黃潤細布」的黃潤。以「黃潤」來代表這種細布，正足以說明這種布的特色，顏色略黃，但織作的很光滑細密。這種「黃潤細布」成為當地的特產，具有代表性的意義，隨着蜀賈人的足跡而帶到全國各地。

其次，討論邛竹的問題。史記集解（註三五）和正義（註三六）皆以係產於邛山之竹，節高實中，可爲杖，所以又稱邛竹杖。所謂邛山，究竟指的是那一座山，位置在何處？我認爲「邛山」並不是專指一座山，而是泛稱邛地之山皆是「邛山」。邛在蜀郡西南徼外，大約在四川西南一帶。

五、結 語

蜀布邛竹傳至大夏的路徑，大致是這樣：蜀布在四川中部，取道嘉陵江至川江，逆流航行至四川南部，取道焚道，至滇國，再向西至昆明（大理），經過滇西縱谷，至緬甸，再向西至孟加拉；邛竹在四川西南，或經過越嶲郡至滇西縱谷，或者取道焚道，和蜀布的路徑相同。蜀人的足跡止於孟加拉，而蜀布邛竹或許被印度人帶到印度，被大夏人買去，或許由大夏人直接在孟加拉購去，這已不關本題宏旨了。總之，漢武帝時滇緬之間的交通說明二件事：一、中國和西方的交通，除了絲道外，尚有西南一道；二、商業上的活動，早於政治上的活動。

（註三四）見漢書卷61，張騫傳。

（註三五）見史記卷116。

（註三六）見史記卷123。